

导 论

一、现代世界体系视野下碧罗雪山地区的民族生计变迁

2012年夏天,笔者去滇西北的碧罗雪山地区做该书研究的选点工作。碧罗雪山为喜马拉雅山的余脉,属横断山脉,是怒江和澜沧江的分水岭。其西为高黎贡山,在两山的夹隔下,形成了著名的怒江大峡谷;东为白茫雪山,两山夹隔又形成了澜沧江峡谷。由此出现了“三山夹两谷”的特殊地理景观。

碧罗雪山地区是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的一个主要聚居地,在其两麓的峡谷地带,分布着怒族、傈僳族、藏族、独龙族、纳西族、白族等诸多民族。笔者最初的主题和设想是研究当地民众的生计。当时的考虑主要是该区域山高谷深、地势险峻、生态环境极为特殊,既没有广袤的土地,也没有辽阔的草原,在这样一种自然条件下生存,势必会和农牧业生产便利的其他地区有很大差异。由此产生的问题就是:在这样一种艰难的环境下,当地的少数民族群众是如何克服困难、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下来的?

这是笔者第一次去一个如此遥远、偏僻的地方做调查。去之前,曾有过无数次幻想,不仅一些读到过的和听说过的原始生计手段如采集、狩猎、刀耕火种等时常浮现于脑海,更是将当地想象成一个自给自足式的封闭社会。

然而,去了以后才知道,现实中的情况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即使是再偏僻的小山村,也已经受到了市场化的侵蚀。其中,最为普遍的是各种现代商品的输入。几乎在每个去过的村子里,我们都发现有小卖部的存在;村民生活中,除了盐、茶、衣服等必需品外,还不同程度地购买电视、手机、摩托车甚至汽车等。在生计方式上,人们也打破了传统的“为使用而生产的”自然经济模式,投入一些牟利性的经济活动当中,如挖虫草、开客栈、做导游、跑运输、外出打工等。

在经历了这样一番感受之后,笔者就不得不对原来所预定的研究主题进行重新审视。因为传统的生计研究主要是侧重于文化对生态环境的适应,这里的文化包括技术、策略、劳动组织形式以及指导整个生产活动过程得以实施的

观念原则。但从实际的调查结果来看，文化对生态的适应其实只是人们完整生活系统其中的一个子系统。如果单注意这一点，势必会忽视另外一个子系统，那就是地方和外界市场的交换系统。

笔者以为，生态适应系统和市场交换系统共同构成了碧罗雪山地区少数民族当前的经济生活模式。生态适应系统的内容包括山地农耕和季节性的转场放牧等，就从事这些生产活动的目的来讲，人们更看重的是其对自身的使用功能，也就是直接的“为使用而生产”。市场交换系统则不然，人们从事与其相关的各种生产经营活动，目的并不是直接供自己使用，而是通过市场媒介，用自己的产品、劳动或服务来换回收入，亦即“为交换而生产”。这两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于是，笔者对本研究主题进行了重新构思。到底该从何处着手，运用何种理论来分析和解释当地目前在经济活动中所出现的这种二元结构现象呢？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传统的“为使用而生产”的生计活动的延续；另一方面，可见外界商品的大量涌入以及各种市场化谋利活动的兴起。

为此，笔者选择了世界体系理论的分析思路。世界体系理论由沃勒斯坦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后来被沃尔夫等一些人类学者所接受，产生了人类学中的政治经济学派。现代世界体系的扩张和渗透是通过将不同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纳入同一个市场交换系统当中来实现的。从结果上来讲，现代世界体系向传统地方社会的扩张和渗透等同于我们常说的世界经济一体化。相比较于现代世界体系，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概念显然更为直白和容易理解，但是缺少一套系统的分析和解释框架，而这正是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的独特贡献。

世界体系既是一个理论概念，也是一个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中的客观事实。如果将碧罗雪山地区的市场化现象纳入世界体系的进程当中来看，思路无疑一下子清晰了许多。因为不论是工业品的购买和消费、野生药材等资源的输出，还是打工、经商等其他谋利活动的兴起，都可以被看作地方卷入世界体系的具体实现方式或是受世界体系影响的结果。

需要说明的是，地方并不直接和世界体系发生关系，两者之外还存在着第三个主体，那就是国家。如沃勒斯坦所说，“社会作为一个抽象体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作为经验性的现实存在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局限”^①。在向世界体系卷入的过程中，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地方有着很大区别。相比于资本主义殖民扩张时期的非洲、美洲等部落社会，中国在很早的时候就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

^① [美]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罗荣渠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化国家。因此，国家在其中的作用就不得不着重加以考量。

那么，地方、世界体系和国家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呢？笔者的结论有两个。

第一，地方与世界体系的经济交换。按照沃勒斯坦的解释，地方和世界体系之间为一种劳动分工的关系，即资本主义中心地向不发达的边缘地区输出工业制成品，边缘地则向中心地提供原料、初级产品和廉价劳动力，两者之间从而形成一种不平等的交换关系。

第二，作为中介者的国家权力。国家权力在地方和世界体系的连接中，总的来说起到两种作用，一种是“润滑”和推动，一种是摩擦和阻碍。国家作用的体现途径如政治经济制度、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的提供等。不同历史时期，国家的制度和经济能力存在很大差别，因此在“润滑”地方和世界体系发生关联的作用和程度上也存在明显差异。此外，国家也会通过法律法规，约束和制止地方民众的某些行为，从而对地方和世界体系的关系产生影响。

中国自古就有“苍生”“黎民”等对普通百姓的称呼，历代统治者都视改善民计民生为己任，如兴修水利、劝课农桑，百姓也将官员称作“父母官”，足见国家权力在普通民众心目中的重要性。到了现代，则有了“造血”“输血”等更为流行的说法。国家对地方民众自生能力的帮助和提升，也会间接地推动其卷入世界体系，因为人们的消费能力增强了。

一个正在经历变迁的地方社区的生存与发展，往往是内部的生产自给、外部的经济交往以及国家的权力这三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历史时期，三者各自的地位作用和影响程度会存在差别，从而导致地方社区整体的生存境况出现变化。

这样，摆在面前的分析对象就变得明确了：一个是跨地区蔓延的世界体系，一个是已经部分卷入其中的地方社会，还有作为两者中介的国家。应该说，像碧罗雪山地区这种半传统、半现代的现象目前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而不仅仅只是某一地方的特殊情况。因此，单单描述这一现象，并无实质意义。

笔者提出的问题是，现代世界体系的扩张给像碧罗雪山地区这样有着自己传统经济和文化基础的地方带来了多大程度的变化和影响，地方民众又是通过何种途径予以应对进而去适应这些冲击和影响的？国家权力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人们的命运和结果如何？

要回答这些问题显然不能只凭想象，还要靠进一步的田野调查及材料事实来予以论证。然而，碧罗雪山毕竟是一个大的区域，笔者不能对该区域所有的地方都加以研究，于是需要选择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地方来作为田野点进行深入研究。

二、作为样本的迪麻洛

行政隶属上，迪麻洛村目前为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简称“怒江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简称“贡山县”）捧当乡辖制。贡山县地处滇西北怒江大峡谷北段，位于东经 $98^{\circ}08' \sim 98^{\circ}56'$ 、北纬 $27^{\circ}29' \sim 28^{\circ}23'$ 之间，东与云南省德钦县、维西傈僳族自治县（简称“维西县”）相连，南与怒江州福贡县相邻，北与西藏自治区察隅县接壤，西与缅甸联邦毗邻，国境线长达 172.08 公里（1 公里 = 1 千米，下同，不再标注）。

从地图上的坐标来看，迪麻洛峡谷大约与沿海的温州处于同一纬度线，与甘肃的嘉峪关处于同一经度线（见图 1）。迪麻洛峡谷为典型的垂直气候。其中，谷底海拔约为 1800 米，气温较高；山顶最高海拔达 4000 多米，气候严寒。因此，和同纬度的温州以及同经度的嘉峪关相比，迪麻洛峡谷及其所在的怒江北部地区所面临的生态和地理条件更为复杂和特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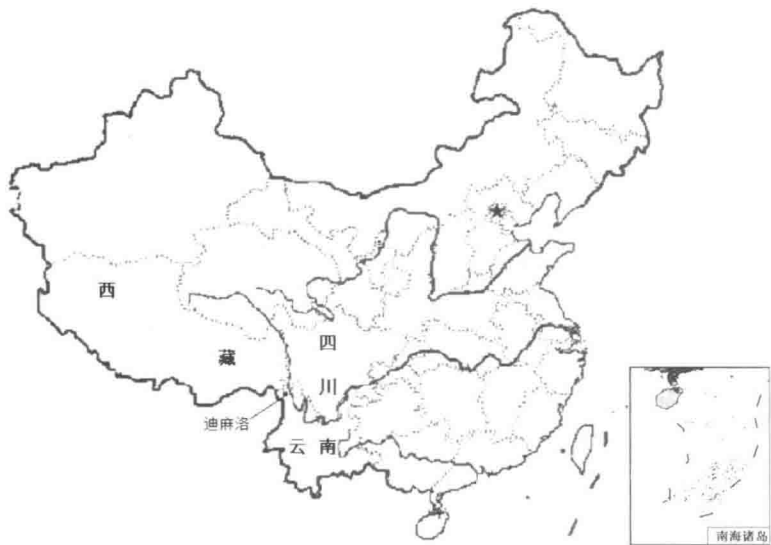


图 1 迪麻洛在中国的位置

最终选取迪麻洛作为田野点，是综合考虑的结果：

首先，从自然环境方面看，迪麻洛位于怒江峡谷北端、碧罗雪山深处，地理位置上相对比较封闭，峡谷内部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经济单位，文化传统也保留较多。

其次，迪麻洛峡谷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2000 多名居民中，除了人口约

占一半的藏族，还有怒族、傈僳族以及独龙族等多个生活和居住于西南边远山区的民族，研究这些民族的现代转型与生存命运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再次，迪麻洛峡谷处于滇藏地区与缅甸的接合部，在历史上就一直远离当时政府的直接统治，到了近现代以后也一直远离省会和首都等政治中心，因而处于国家行政的边缘地区。

最后，和政治上一样，迪麻洛及其所在的怒江北部地区长期以来生产力水平低下，远离交通要道和商贸中心，沿海和内地等大城市对该地区的经济辐射能力相对较弱，因此经济上也是一个边缘地区。

与迪麻洛结缘，完全是一次巧遇。第一次去碧罗雪山的时候，笔者跑了很多地方。在其东麓，去了德钦县燕门乡的拖拉村和茨中村，后来还沿着澜沧江逆流而上，到了西藏的盐井乡；东麓的调查结束之后，又去了西麓的怒江峡谷，在贡山县的丙中洛等地做了一段时间的调查。

东西两麓的调查结束之后，笔者仍感不足。因为目前的调查主要停留于碧罗雪山脚下的峡谷地区，对于山上的实际情形仍然不甚了解，即使知道也是一些道听途说的东西。有鉴于此，笔者又筹划了一次翻越碧罗雪山的行程。在丙中洛一位朋友的指引下，我们去了翻山的起始地——迪麻洛。迪麻洛为碧罗雪山西侧的一条小峡谷，长度大约有 50 公里，里面的 12 个村子现在被划为一个大的行政村，隶属于贡山县的捧当乡。

迪麻洛峡谷地处碧罗雪山之中。民国年间的《菖蒲桶志》中描述道：“怒山即碧罗雪山，发脉于昆仑山，连前藏唐古拉山，经川边西康，蜿蜒而下，直入菖境，盘亘怒江东西，入上帕属；高度由怒江边起约九千五百余尺，山西为菖蒲区域，约长四百四十里，山多林木。其巅冬春积雪甚多，悬崖峭壁峥嵘屹立，夏秋之交，雪水暴涨，尽由山顶飞流而下，直入怒江，每届冬春大雪封山，必待次年五月，雪始融化，方能翻越。”^①

捧当乡位于贡山县东北部，乡政府驻地捧当距离县城约 20 公里。捧当乡是 1984 年年初分别从丙中洛乡和茨开镇划出部分地区组成的新乡，迪麻洛村即由丙中洛划出。其东部和北部与迪庆藏族自治州（简称“迪庆州”）的维西、德钦两县接壤，南部连茨开镇，西北部靠丙中洛乡。整个地形北窄南宽，貌似葫芦（见图 2）。

^① 转引自政协云南省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委员会、政协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怒江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八辑），政协云南省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委员会、政协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1991 年刊印，第 15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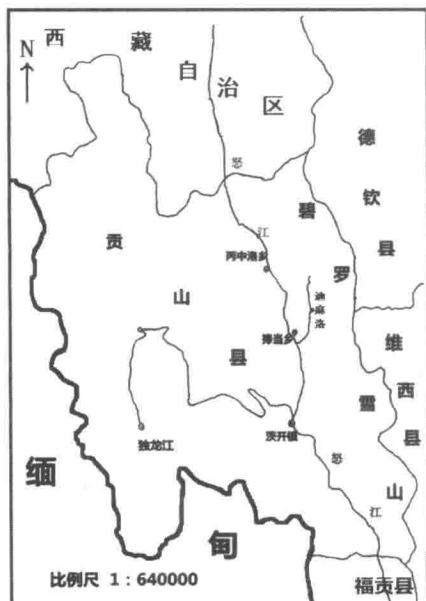


图2 迪麻洛所在区域

迪麻洛在1984年以前归丙中洛管辖，之后从丙中洛划出，归入捧当，直至今。捧当乡总面积488平方公里（1平方公里=1平方千米，下同，不再标注），下辖闪当、永拉嘎、迪麻洛、马西当4个村民委员会，38个村民小组。2012年年末，全乡共2218户、6078人。其中，乡机关及外来户共421户，449人；闪当村494户，1456人；迪麻洛村624户，2159人；永拉嘎村508户，1499人；马西当村171户、515人。（见表1）

表1 捧当乡4个行政村以及外来户等的人口分布

单 位	户 数	占全乡比例（%）	人 口 数	占全乡比例（%）
闪当村	494	22.3	1456	24.0
永拉嘎村	508	22.9	1499	24.7
马西当村	171	7.7	515	8.4
外来户	421	19.1	449	7.4
迪麻洛村	624	28.1	2159	35.6

注：数据来源于《捧当乡人民政府乡情简介》（2012年最新版）。

可见，迪麻洛为全乡最大的一个村，它的居民户数占全乡的28%之多，人口数约占全乡的36%。

迪麻洛地处怒江东岸，碧罗雪山之中。发源于北部高山的迪麻洛河沿着整条峡谷奔腾不息，最后汇入怒江之中。从 228 省道下车，走过一座人马吊桥，转过迪麻洛河和怒江交汇的拐弯处，便开始走进了迪麻洛峡谷。迪麻洛峡谷是一条窄长的山谷，从入口处走到村委会所在地，大约需要 2 个小时。

村委会驻地海拔 1860 米，年平均气温 12 摄氏度，年降水量 1350 毫米。该村东临迪庆州的德钦县，南邻本乡的永拉嘎村，西邻闪当行政村，北邻丙中洛，辖有各科当、补它、龙坡、木楼、财当、桶当、普拉、从尼、王其王、青马塘、白汉洛、施永功等 12 个村民小组。村委会所在的中心地距乡政府约 8 公里，距县城 28 公里。

民族构成上，全村以藏族和怒族为主，其中藏族 968 人、怒族 1004 人、其他少数民族 167 人、汉族 20 人（见表 2）。语言上，几乎所有村民都会讲三种语言，分别为藏语、怒语和傈僳语。只有一些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会讲普通话，完全能够流利表达的不算太多，绝大多数老年人则略微懂得一点。

由于地形因素的限制，12 个村民小组的位置极为分散。从进入峡谷的第一个村子到最里端的一个村子，差不多相距 20 公里；从谷底的村子到山顶上的村子，往往要走上好几个小时。因而，村子之间的交往甚为不便。

表 2 迪麻洛村的人口分布与民族构成

村民小组	户 数	人 口 数	户平均人口	民 族 成 分
桶当	51	168	3.3	傈僳、怒、藏族
普拉	40	133	3.3	怒、傈僳族
龙坡	37	137	3.7	藏、怒、傈僳族
补它	32	115	3.6	藏、怒、汉族
各科当	41	149	3.6	藏、怒族
青马塘	31	104	3.6	藏、怒、傈僳族
财当	107	326	3.0	怒、藏、汉族
白汉洛	109	341	3.1	藏、怒、傈僳、汉族
施永功	40	167	4.0	藏、怒、傈僳、独龙、汉族
木楼	42	163	3.9	怒、傈僳族
从尼	48	180	3.2	藏、怒、独龙、汉族
王其王	46	176	3.7	怒、藏、独龙、傈僳、汉族
总计	624	2159	3.5	—

注：该数据由捧当乡人民政府办公室提供。

从贡山县乘车 20 公里到捧当乡，从捧当往下有两条岔路：一条往北直通丙中洛；一条往东，跨越怒江，再往回转过一个山头，进入即是迪麻洛峡谷。迪麻洛峡谷是隐藏于怒江大峡谷背后的一条小峡谷，其走向大致和怒江大峡谷平行。进入迪麻洛的道路为一条坑洼不平的土石公路，修建于 1997 年，晴天尘土飞扬，雨天路上满是泥浆；公路下方为水流湍急的迪麻洛河，上方为高山和悬崖峭壁，时常有塌方和滚石的现象出现。

进入迪麻洛的第一个村子为王其王。王其王原本是一个坐落于河边平地的大村庄，村民由怒族和藏族构成。2002 年，一个叫作华龙电力公司的企业在迪麻洛河上修建了水电站，电站的位置正好位于王其王村，电站开始修建以后，王其王村的村民被迫搬迁。现在王其王村共分布于三个不同的地方，其一叫作贡卡，有 15 户人家，位于大坝附近的一个山头上；其二叫作华源新村，有 12 户人家，搬出了迪麻洛峡谷，位于捧当乡的闪当村界内；其三仍叫王其王，有 19 户人家，搬到了离大坝下面不远的一块斜坡上。（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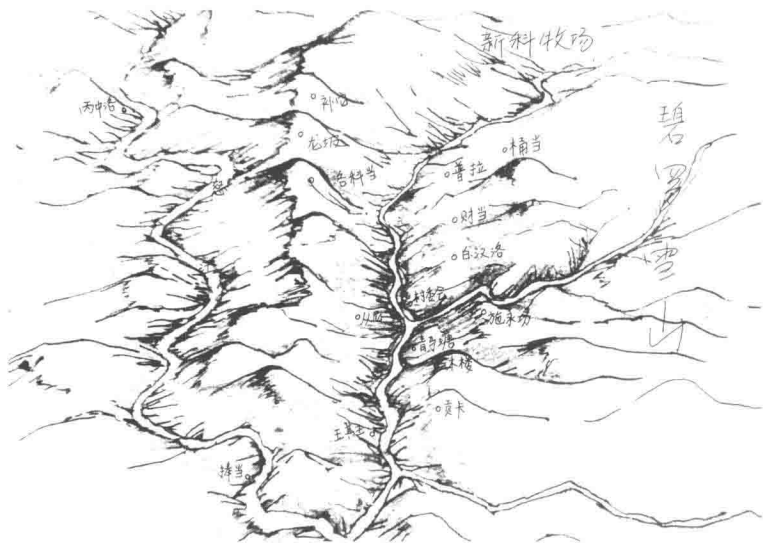


图 3 迪麻洛峡谷地形与村落分布

第二个村子为木楼。木楼位于王其王村贡卡部分的上面，海拔在 2700 米左右。从贡卡往上爬 2 个小时的山路，才能到达木楼。木楼村以藏族为主，42 户人家分散在一块山头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地点可以俯瞰村子的全貌。前往木楼村的道路有新旧两条，旧路为陡峭的羊肠小道；新路为盘旋而上的土石路，可以通行汽车和摩托车。

第三个村子为青马塘。青马塘是迪麻洛峡谷中唯一一个村民全部居住于山

谷底下的村子。31户人家沿着迪麻洛河边的平地呈长条状分布，相比于山上的村子，该村的人口分布算是比较集中的了。青马塘村靠近迪麻洛村村委会，交通方便，从乡政府所在地坐车到这只需40分钟左右的时间。

第四个村子为施永功。施永功村位于青马塘村上方的一座山头上，居民40户，村民以藏族、怒族为主，另分布有少量的傈僳族、独龙族和汉族，中心海拔2450米，和木楼村隔山相望，从山底到达该村大约需要2个小时。（见图4）和木楼村一样，通往施永功的道路也有旧路和新路。通往山上的旧路有很多条，多为人马出行使用；新路为一条粗糙的土路，可以通行大型汽车。



图4 半山腰的施永功村

第五个村子为从尼。从山谷底下继续往里走，过了青马塘村，就是从尼了（见图5）。从尼组有48户人家，分住于迪麻洛河两岸，其主体部分位于迪麻洛河西岸的一块坡地上，东岸分布的只有十几户人家。在西岸，有3户人家还居住在陡峭的半山坡上，似有一种遗世独立的感觉。

从尼原本也是迪麻洛峡谷里的一个大村子。1979年10月，怒江地区发生罕见的暴雨，沿怒江一线的贡山、福贡、碧江、泸水等县，不同程度地受到泥石流的冲击，道路阻断，农田被毁，人畜伤亡惨重；仅在贡山县，死于泥石流的就多达36人，其中灾情最为严重的就是本书研究的迪麻洛村，曾执行过救援任务的李汝金先生对此有过详细的描述。那次事件之后，一部分从尼群众为了寻找生路，不得已搬到了离村子中央较远的“阿鲁腊卡”山上，从此定居

下来，并且更名为补它。

通往从尼村西岸，有两座桥，相隔大约 300 米。下游的为一座木头搭建的简易桥，只能通行人马；上游的为一座新修的钢筋水泥桥，可以通行机动车辆。令人意外的是，从尼村并没有公路，村民们以前沿着河边修建了一条只能通行人马的便道，但是现在已经全部坍塌、不能通行。从尼村的摩托车只能常年停放在村子下面的桥面上。和青马塘一样，从尼靠近村委会和集市，社会往来和商业往来方面比较容易。



图 5 山脚下的从尼村

第六个村子为白汉，又名白汉洛。白汉洛村位于迪麻洛河东岸，中心海拔 2500 米，村子最上方人家的海拔达到 2700 多米。白汉洛是迪麻洛峡谷中最大的一个村子，居民有 109 户，整个村子居民的分布比较分散。在一个凸起的山梁上，从最底下的一户人家到最上方的一家，海拔落差达四五百米；东西跨度更大，从山梁中间，一直延伸到两边的山凹深处。当地有一座著名的天主教堂，即白汉洛教堂。该教堂建于清末时期，距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因曾经轰动一时的“白汉洛教案”而出名；时至今日，每年都有不少中外游客慕名前来观光旅游。白汉洛村至今仍未通公路，村民出行只能靠人背马驮，几乎家家户户都喂养骡马，另有少量驴子。

第七个村子为财当。财当村位于白汉洛村前方的一个山头上（见图 6）。村子由两个部分构成，一为村子的主体部分，叫作财当，分布在海拔较高的半

山腰上；另有一个独立的部分，叫作木拉登，分布于山底下。财当村共有居民107户，仅次于白汉洛村，以怒族和藏族为主，另有少量傈僳族、独龙族和汉族居民。现任的村委会主任肖刚即出自该村。财当村目前已通公路。2010年左右，村民在没有取得政府资金支持的情况下，自筹资金修建了一条上山的土石公路，虽然坑洼不平、崎岖难行，但车辆总算可以通行。



图6 财当（左）和白汉洛（右）

第八个村子为普拉。普拉村有40户人家，大部分家庭信仰天主教，只有十几户人家信仰藏传佛教。普拉村至今未通公路，正在施工中的德贡公路正好从村子上方的半山腰穿过，从村子往下走有一条羊肠小道通往河边的旧公路。村子里的摩托车和其他机动车辆都停在山下的公路旁边，村民运输进出的货物，也全靠人背马驮。

第九个村子为桶当。桶当是迪麻洛峡谷最里端的一个村子，从普拉村继续往前走，步行大约1个小时才到。（见图7）村民有51户，整个村子从上而下沿一条窄长的带状山坡分布，坡度极大，只有活动中心点的篮球场和教堂附近稍微比较平坦，人若从村子往下走，会不由自主地加快脚步往下奔跑。

桶当目前为一个半通公路的村子。正在修建中的德贡公路从村子头顶穿过。居住在公路下方的村民们运送东西，仍然要靠一条狭窄、崎岖、回转的丛林小径。和普拉村一样，机动车辆只能通行到村子下方的公路旁，上山的路依然要靠人力和畜力来走。



图7 斜坡上的桶当村

第十、第十一和第十二个村子为一个大的自然村落，由于地缘位置极为相近，可以放在一起讲述。这3个村子有一个总的名称“阿鲁腊卡”，从外到里分别称作各科当、龙坡和补它。因3个村子分散在一个叫作“阿鲁腊卡”的山头上而得名。

阿鲁腊卡（见图8）上的3个村子共有居民110户。其中，各科当位于阿鲁腊卡山的南侧，龙坡居于其中，补它则分布在最里端的北侧，峡谷斜对面即可望见桶当村。各科当和龙坡为这里的“原始”居民，补它则是原来从山下的从尼村分离出去的一个小村子。

补它村的村民虽然搬到了山上居住，但是仍然和从尼村村民有着很深的感情，两个村子里的村民之间大多保持着亲戚关系，联系较为紧密。此外，补它村村民仍然部分地保留着自己在现在的从尼村里的土地。现在已经有两户人家从山上搬了下来，在原来属于自家的地里建造了房屋，重新定居生活。

和其他村子不同的是，阿鲁腊卡山上的3个村子并不是各自为政、相互独立的；相反，它们相互依存，过着共同的社会生活。比如，3个村子共用一个天主教堂祈祷、做礼拜，共用一个篮球场运动、比赛，一起过节、唱歌、跳舞、聚餐，一起使用山上的牧场等资源，俨然一个整体。



图8 远眺中的阿鲁腊卡

迪麻洛的12个村子有着一个共同的社会活动空间，即中心地。中心地距离峡谷入口大约8公里，距离最里端的一个村子10多公里，距离两旁山上的村子也不算太远，从地理位置上来说有利于村民之间的聚集和交往。

在这块中心地上，现在有村委会、集市、居民、商铺、篮球场、学校，可谓是整个迪麻洛峡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见图9）

迪麻洛中心地的形成完全是出自政治带动的原因。民国时期，这里就被作为村公所的驻地。新中国成立以后，迪麻洛的行政单位为丙中洛区下面的一个乡，这里当时也是乡政府的驻地。20世纪80年代并入捧当乡以后，又改为一个行政村，因此又变成村委会之所在，并且一直延续至今。

1997年，通往外界的公路未修建以前，村子的中心地只有几家杂货店铺，没有摆摊做生意的现象。公路修通以后，外界的流动商贩逐渐进入，开始在村子里摆摊做生意，迪麻洛的集市贸易也由此而起。刚开始的时候，集市被定在每周的星期天，后来又改到星期四，并且一直延续至今。

除了商贸上的因素外，政治和社会活动也是吸引村民到此聚集的一个重要原因。每当村委会有重要的会议，都会提前通知各村组长，组长再通知村民，到了开会的日子，村民们便会提前做好准备下山。2013年9月，新上任的村委会领导为了纪念国庆节，举办了村际的篮球、拔河、射弩和歌舞比赛。一个多月的时间里，12个村子里的村民在聚集次数和规模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

高度。



图9 迪麻洛村村委会与集市所在的中心地

三、研究综述

青藏高原东部的高山峡谷地带是我国一个生态地理条件比较特殊的地区。民族学、人类学近年来关于该地区的研究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集中于当地各民族的传统生计，二是“沟域经济”视角下的发展话语探讨。

首先来看传统生计方面的研究。生计为一套系统的社会生产与再生产活动，其代表性的理论方法为美国的文化生态学。文化生态学主要从人类对环境的生存适应方面来寻求文化内容及变迁的解释，对于自然环境依赖比较严重的山区民族的研究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其中，莱斯利·怀特依据社会复杂程度与技术进步两大因素来判断发展阶段。

怀特指出，技术的进步、工具的发明使更大程度的“能量获取”得以实现；随着人口的增长，冲突与战争的频率增加，极大地推动了社会政治组织的发展，高级的协调形式出现了。怀特关注人类整体的文化而非各种具体的文化，追求通则，而不包括对个例的重视。怀特认为，文化是一个组织起来的一体化系统，分为三个亚系统，即技术系统、社会系统和思想意识系统。“技术系统”是由物质、机械、物理、化学诸手段，连同它们的技能共同构成的。该系统将人与环境联结起来，包括生产工具、维持生计的手段、筑居材料以及

攻防手段等等。“社会系统”则是由表现于集体与个人行为规范中的人际关系构成。它包括社会、亲缘、经济、伦理、政治、军事、教会、职业、专业、娱乐等。思想意识系统则由音节清晰的语言及其他符号形式所表达的思想、信念、知识等构成。这三个亚系统彼此相关，一个发生变化势必会影响到其他系统。但是，它们3个各自对于文化系统整体的作用却并不相同。其中，技术系统起着主导作用，它具有原始的和基本的重要性，全部人类生活和文化皆依赖于它；社会系统具有次等重要性，它依附于技术系统，技术是自变量，社会系统为因变量，技术系统因而决定社会系统；思想意识系统是一种信念的结构，位于文化系统的最顶层，从中可以找到对人类经验的解释，它表达技术系统，反映社会制度。

怀特认为，技术是理解人类文化成长和发展的钥匙。文化要满足人类的生存和延续，需要借助于宇宙中的物质和能量。因此，利用和控制能量，就成为文化的首要功能。人类生产食物、衣物和其他物品所消耗的能量与利用和开发能量的技术手段成正比。据此，可以对任何一种文化情境或文化系统区分出三种因素：①每人年均利用的能量；②借以利用能量并付诸使用的技术手段之效率；③满足人类需要的物品与服务的人均产量而测定的文化发展程度，取决于人均利用的能量和借以将能量付诸使用的技术手段效率。用公式表示就是：

$$E \times T \rightarrow C$$

其中， C 代表文化发展程度， E 代表每年人均利用的能量， T 代表耗能过程中使用的工具的质量与效率。^①

与怀特相反，朱利安·史徒华主要关注具体文化的具体适应。朱利安·史徒华想要知道的是：“人类社会对其环境的适应究竟是需要一套特殊的行为模式，或者在某种范围之内好几套模式都可以适用。”^②为此他提出，研究一个社会的生态适应需要三个步骤：第一步是研究生产技术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简单的文化比高级的文化更直接受到环境的制约。第二步是分析以一项特殊技术开发一特定地区所涉及的行为模式。若干生计模式对一般的生活方式加上了非常严的限制，而其他的生计模式则允许生活方式有大幅度的变化余地。生产模式不只决定于粮食及财货直接生产之有关的习俗，也决定于使人到达资源所在或把货品传送于人的运输工具。第三步是确定环境开发所需的行为模式影响文化的其他层面至何种程度。这项步骤需要全观法，包括人口、聚落形

① 参见[美]怀特《文化的科学》，沈原、黄克克、黄玲伊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55页。

② [美]朱利安·史徒华：《文化变迁的理论》，张恭启译，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45页。

态、亲属结构、土地所有、土地利用以及其他重要的文化特质，如果对此加以分割，将无法掌握它们彼此之间及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文化生态学为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它把注意力转移到文化内部与外部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上，把文化与环境的互动设想为推动进化的主要动力。继文化生态学之后，人类学中又兴起了一股结构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其代表人物为法国的戈德利耶（Godlier）、特雷（Ernmanuel Terrey）以及英国的布洛克（Maumee Bloch）等。结构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生态学做了批评，因为它主张文化进化的决定因素来自于特定的社会关系结构，而不是来自于自然环境或技术。它不反对生态因素（自然、技术和人口），但通过社会关系过滤这些东西，把它们压缩成分工、协作、再分配等生产与政治组织等分析框架中的次要因素。它批判文化生态学是庸俗的唯物主义，认为后者沉溺于资本主义的“拜物教”，没有注意到物质现象后面的社会关系和象征符号。它指出英国社会人类学的传统田野研究所关注的社会关系——谱系、氏族或偶族（半族、两合组织）等等——有别于生产方式当中的社会关系。它批判把社会组织的表层符号当作社会结构的内在模型，忽视生产关系这一隐蔽的制度操纵者。^①

具体到青藏高原东部地区，一般性的概括研究如阎建忠等人的《青藏高原东部样带农牧民生计的多样化》（载《地理学报》2009年第2期）。该文章对高山峡谷地区农牧民生计多样化的具体种类以及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做了全面的分析和整理。实证性的调查研究如李何春、李亚锋的《碧罗雪山两麓人民的生计模式》（中山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等。

生计方式对于一个民族和地区的研究意义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在受世界经济一体化冲击和影响的当下，传统生计方式的研究又是不完整的。从实际经验来看，即使是再偏远的小山村，也已经受到了市场化的侵蚀，人们和外界的社会经济早已连为一体，其生存也不再是简单地依靠对自然生态条件的适应和群体内部的相互协作来实现，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界市场的变化。因此，只注意偏远民族地区传统的一面，而忽略其与外界政治经济的交融，显然是有失偏颇的。

其次来看沟域经济。有学者认为，西藏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相对封闭的沟域经济系统。“考虑到西藏绝大多数居民居住于两山夹一河的沟内，其经济活动也主要在封闭的沟内进行，再考虑到‘域’这个词的多重含义和在经济学文献中的反复引用，便想到用‘沟域经济’对西藏的经济现象加以

^① 参见〔美〕谢丽·奥特纳《20世纪下半叶的欧美人类学理论》，何国强译，载《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

表述。”^①

沟域经济以西藏等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为出发点，很形象地概括出该种地形样貌下所产生的经济特点，如樊胜岳、琚婧、韦环伟等人在《西藏地区沟域经济系统耦合模式研究》^②一文中就指出的：“首先，沟域的存在形成了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其次，高山深沟阻断了人、物和信息的横向交流；最后，畜牧业和种植业的低效率。”

樊胜岳等人的概括有其针对性和准确性，如指出高山深沟对地方内部和外界社会经济彼此间在交往上的限制；但也应该看到，沟域环境的存在对自给自足经济的保留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是否一定和高山峡谷的地理地貌相关联？另外，在高山峡谷区，种植业和畜牧业是一种对有限资源充分利用的多元化生存策略选择的结果，说其低效率是无意义的。

罗绒战堆将高山峡谷地区分作“沟内”和“沟外”两个系统来进行分析，认为外部系统的侵入打破了内部系统原有的平衡。他还认为，正是由于对沟域基础经济系统研究的不足，导致了政府的各种弥补差距的政策受到了影响。罗绒战堆虽然注意到峡谷内外两套系统的区别，但经济话语太过明显，依然缺失人类学所关注的地方主体话语，而且缺少一套宏观的系统理论方法去贯穿其研究，因此仍然略显表象化，深度不够。

那么，究竟该如何理解一个自成一体的地方社会和外部世界之间的联系和交往现象呢？早期人类学中的传播论者虽然注意到了不同地区间文化的传播和影响，但他们只关心文化形式和文化特质是如何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传播的，避而不谈人群之间在技术上和组织上的不平等状况。传播论者虽然也关注历史，但是对生态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母体漠不关心，虽然文化形式和文化特质就是在这些母体中通过一定时空传播的。^③传播论者虽然也注意到了不同地区之间的联系，但是没有关注到这些地区里生活着的人民。

在英国功能主义盛行的年代，利奇是一个独特的例外。功能论者主要关注孤立整体在内部是如何运作的，而利奇却注意到历史的变化过程以及外部因素的影响。真实的社会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中。人口、生态、经济和外部政治情境所形成的并非一个固定的环境，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任何真实的社会都是时间进程中的一段。利奇认为，一个地方的社会文化变迁是内外因素相互动

① 罗绒战堆：《沟域中生存的藏人》，载《中国西藏》2007年第4期。

② 樊胜岳、琚婧、韦环伟等：《西藏地区沟域经济系统耦合模式研究》，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1期。

③ 参见[英]埃德蒙·R·利奇《缅甸高地的政治体系》，杨春宇、周歆红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9页。